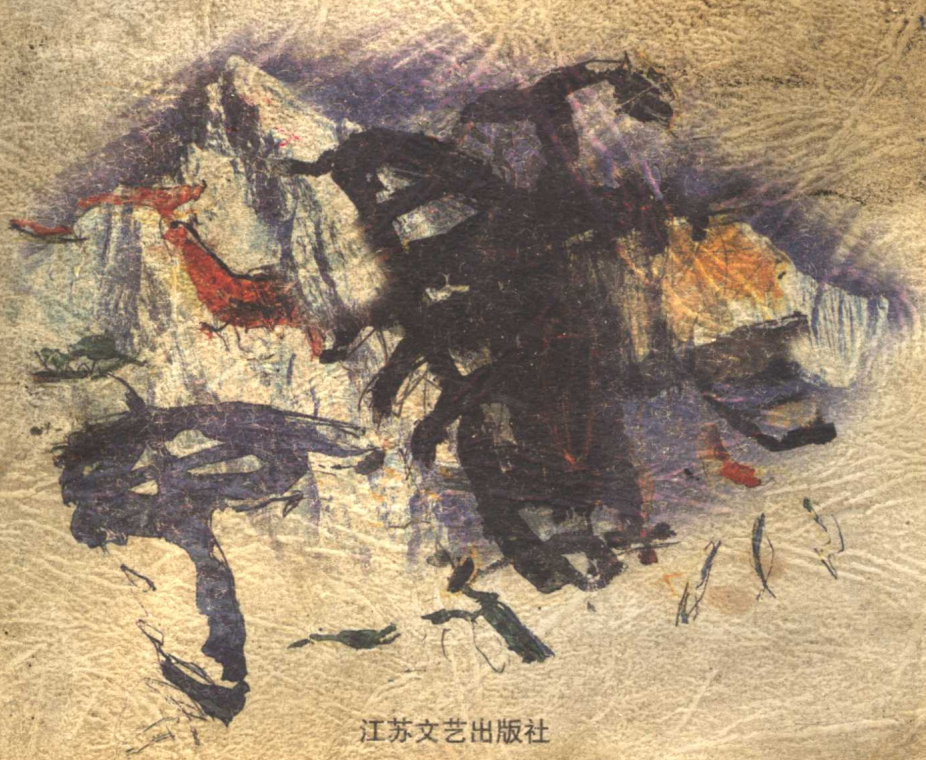


边缘文丛

喜马拉雅山

何顿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喜

马

拉

何顿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雅

山

喜马拉雅山

作 者:何 顿
插 图:韦斯琴
责任编辑:汪修荣
责任校对:何 凡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京新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13

字数:28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69-7/I·1089

定 价:1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摘自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第一章

客车是一辆红色的破破烂烂的客车，屁股上还有一块曾经被什么车撞坏的凹处，油漆剥落了，露出了猪肝色锈迹。我站在这辆车前，左看右想，后悔不该买车站的车票，这辆烂车能按时把我们拉回家？我妻子要买车站的车票。她说：“我们不坐个体户的车。”我们在去年暑假回白水时，坐的是个体户的大客车，沿路停个不停，见客就上，结果车上挤得满满的，车内空气一点都不好，各种气味充斥在鼻孔周围。结果妻子晕车了，呃呃呃地吐了几次，吐得一脸苍白，像病妇的脸，还像一面投降的白旗子在我眼里晃荡。今天妻子要求我无论如何要买车站的车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我怕一坐个体户的车，又出现那种烦死人的情况——沿路不断上客，把本来就很窄的车内空间占领得一点不剩。妻子和女儿都坐在车上，司机还没来。车票上注明是一点半，此刻离一点半还有一刻钟。我担心这辆车能不能把我们按时载到。我把视线抛到车站里，车站内乱糟糟的，客车东停一辆西停一辆，西北风把乘客都赶到车内或屋里坐着去了，西北风在车

站里呼啸着，刮起了地上的纸屑，还把门前的几棵常青树刮得呼哧呼哧直叫。妻子迈步到车门旁，探出头瞧着我——那张脸已冻红了——对我说：“好冷的，到车里来坐。”

“不冷，不冷。”我说。“我就站在这里，车内的空气闷闷的，一种怪味。司机来了，你就喊我。”

“你站在这里吹北风不冷？”

“不是那样冷。”我说。

妻子的头缩了进去。我把身上这件黑呢子大衣的领子翻起来，用它来遮挡猛烈的西北风，呢子大衣的领子一立起来我便感到了一种暖意，就不觉得西北风直往颈根里钻了。我把两只手插进袖筒里，紧紧地抱着两边的肘，脚不停地跺着。我穿着里面没有毛的单皮鞋，脚上也只穿了双大拇指处早已被坚硬的脚指甲戳破了的旧尼龙袜子，双足在这寒冬腊月的空地上，自然是冰凉的，只能靠不停地跺脚去消除足底的寒气。天空在我眼里一派阴惨惨的，既看不到乌云也看不到太阳，是那种要下雪的情形。我相信这几天会有一场大雪下，这个世界是需要用大雪来冻死细菌了，现在的世界病菌太多了，雪可以使这个世界稍稍变得干净一点。我女儿出生五年了，还从未一本正经地体验过一场雪，往往雪今天下，第二天就开始融化了。不像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冬天，那时候屋檐上吊下来的冰常常在两尺来长以上，凛冽还十分狰狞，很壮观的。我的眼睛瞪着惨淡的天空，想起自己小时候出于一种好奇的心理，站在椅子上，仰起头用舌头去舔吊下来足有三尺长的冰柱的情景。那是一间茅屋子，在我家对面巷子拐进去的深处，紧靠着一处常年流着臭水的阴沟。我又记起有次我仰起脖子，伸出舌头去舔冰时，父亲看见了，父亲对我说：“罗定，邈遑。”父亲是说冰邈遑。我看着阴惨惨的天空，我希望下雪

和冰冻，希望看到雪变成冰从屋檐上吊下来三尺长，希望这个世界变成白色的。我的脚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不停地跺着。

妻子探出头来说：“罗定，罗定，要开车了。”

我没注意到司机，我说：“司机来了吗？”

“来了，快上车。”妻子说。

我告别了这块冰冷的但是空气很好的地方，迈进了拥挤的充斥着各种气味的车厢里。因为怕冷，车厢里所有的窗户都关得很死，人们肺叶里吐出来的二氧化碳、肛门里排泄出来的废气以及从皮袋和塑料袋上散发出来的皮革气味在车厢里形成了一股难闻的暖流，使我皱起了眉头。我对气味格外敏感，我的嗅觉天生很灵，这让我神经变得比较脆弱。别人无所谓，我却有所谓。我最害怕就是坐汽车或坐火车，害怕这么多人拥挤在一起产生的混合气味。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这个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什么都能适应，但我天生就是这么一个不能与他人为伍的鼻子，父母给的，我无法选择。我女儿见我皱着眉头走到她身旁，就叫了我一声：“爸爸。”她叫完就对我一笑，那是一种非常可爱的笑容，笑时白白的小脸蛋上，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右边脸上还呈现一个小小的酒窝。

“你要坐好，别站着。”我对女儿说，“坐下。”

女儿一笑，在我身边坐下了。汽车徐徐向车站外驶去。车上坐着很多人，他们的衣着都很土气，穿得稍好点的，大概是白水县城人，穿得不讲究的无疑是白水县城乡下人了。他们大都是到长沙市来打工，做泥木工活或者做保姆，他们的脸都很黑，都有着乡下人那种质朴和单纯。汽车在一条宽敞的柏油路上奔驰，柏油路两边的树木和房屋一一从我们的视野里闪过去，好像它们是向后飞去似的。妻子坐在车窗旁，女

儿坐在中间，我的视线越过她们两人的头瞧着窗外，这么瞧了我觉得累，就把视线收回到车厢内了。我忽然感觉坐在我们前面一排的一个年轻男人总是偏过头来望我们，当我的视线和他的目光一遭遇，他又把头掉了过去。如此这般已出现三四次了，这让我心里有点警惕，我心里的一根神经在考查他，他怎么老看着我们？他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国字脸上戴副眼镜，这张脸比车上的其他人来说，显得白一点；鼻子给我的感觉很大，嘴唇也很厚；头发向后梳着。他看上去不坏，他的脸上没有狞恶的内容，但是他老看着我们干什么？车上的气味很不好嗅，我把脸埋到竖起的呢子大衣的领子里，只好嗅自己身体的气味。我并不是一个自恋的男人。我的衣着都很随便，我也没有经济实力让我讲究。在宏力文化发展公司里，我是唯一一个不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我不是公司里那些沉湎于玩乐和享受的人，我也不懂得幽默。我只希望这个世界里多点好空气供我呼吸，我只想任何一间房子都门窗大敞，让好空气进入我的鼻孔，然后再从肺叶里吐出来，使我们少点病痛且多活几年。车厢里除了我嗅进胸腔里很不舒服的各处人体和衣物的气味，还有很浓烈的汽油味。我最讨厌嗅汽油味，这个世界一年年温度上升，以至长沙的冬天里难得下一场大雪，不就是汽车排气管排出的大量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内产生的温室效应吗？

汽车驶出长沙，奔上了一条视野不再被建筑物阻塞的公路，两边开始出现农田和山丘了。农田是那种沉睡着的农田，上面只剩着一个个庄稼收割后留下的茺儿，呈干枯的褐色，井然有序地排列在灰褐色的农田上。山丘和树木也是那种昏睡着的模样，看不出生气在哪里。我的视线在飞过去的景物上扫射着，我企图看清什么，企图抓住什么。我脑海里自然就

出现了喜马拉雅山，那是我极想去攀登的山，那是世界的屋脊。在地球上，珠穆朗玛峰是海拔最高峰。我想去西藏走走，去看看这座世界最高峰。人活着不就是几十年？我一定要趁我还有力气的时候去那里多拍些照，把自己对世界屋脊的感受拍下来。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十年前，我是班长，他是团支部书记。他很有野心，能忍辱负重，年轻轻地就爬到了副厅级的位置上。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中从政最见起色的，一辆蓝色的桑塔纳总是载着他这里那里转。去年的一天，大学同学聚会，我们吃完饭聊天，大家都丢下自己不去关心，谈起了海湾战争，谈起了波黑战争，谈起波黑地区的很多难民无家可归和无端端地被打死、病死和饿死什么的时，我突然升出了想去西藏走走的念头。我说：“我真正的想法就是到西藏看看，去瞧瞧世界的屋脊。”我的这个当了副厅长的同学对我扑哧一笑，我说的扑哧一笑并不是真正扑哧一笑，我只是这样形容。他笑后友好的样子瞥着我，“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的？”“就是刚才。”但是我怕我这样说他会进一步扑哧一笑，我转口说，“读大学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事实上这种想法是在他们说臭氧层和波黑战争的时候产生的。这位官至副厅长的大学同学又对我友好地一笑，“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怎么不要求去西藏？”我回答他说：“我只是想去看看，我并不想在那里工作。”他又一笑，那笑容虽然不乏友好，但也含有嘲讽意味。他是个聪明人，他不会把嘲讽的东西轻易地放在脸上展览，但是他可以把嘲讽的笑容用友好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名叫宁志国，他的额头光亮亮的，顶已经秃了，那些部分也是光亮亮的，给人一种稳健和聪明的脑瓜的印象，还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我的脑壳在想着这些东西时，客车像一个老太爷一样，接

连咳了几声，声音同放鞭炮一样响，接着驾驶室里冒出了浓烈的黑烟；一股有毒的黑烟迅速弥漫开了，使众多乘客不得不捂住鼻子咳喘。客车颤抖了几下，在路旁停下了，司机把车门打开，掉头对乘客说了声：“要解手的就解手，车烂了，要修。”

完了，果然在我的意料中。我对妻子说：“我说了不要买车站的票，你硬要我买车站的票。现在你看到了……晚上八点钟能到家就是好的了。”

妻子横我一眼，“你说什么废话？”她反击我说，“你自己买了一辆烂车的票，就怪我？我又没要你买烂汽车的票……”

我不想听她这些，她总是把她犯的错误的责任往我身上推。我站起身向车门外迈去，我害怕嗅那股气味很怪的黑烟。我跳下车，车外是一片开阔的农田，一直伸向远方；面对的是一座深绿色的山丘，山丘周围有些农舍；路旁有些树木，叶子都掉了，只剩了光溜溜的树枝；几步外还有一家农民开的饭店，那儿有一个土砖建的上面盖着一块白水泥瓦的简陋的厕所。有两个随我下车的男人正朝那间臭气熏天的厕所走去。我站在树下，领略着西北风的吹抚，大口地呼吸着农田上飘来的新鲜空气，瞧着灰褐色的农田向远方铺去。妻子也下了车，走到我一旁。女儿也下来了，她跟我一样对气味比较敏感，她下来时接连咳了几声，然后就站到我身边。

“爸爸，汽车怎么冒烟呢？”女儿问我。

“这是汽车烂了。”

“爸爸，我们怎么要坐烂车呢？”女儿盯着我。女儿还只五岁，在这个世界上还什么都不懂——这种年龄认为世界是新奇和美好的。我有点怨妻子，不是妻子坚持要我买车站的

车票(车站的票价要比坐个体户车便宜八角钱),至少汽车就不会烂在路上,说不定现在已经到家了。我们是十一点钟到达车站的,要是那时候坐个体户的车走,再慢,此时此刻汽车也到达白水县城了。我把责任推到妻子身上说:

“我本来想坐个体户的车,你妈妈要我买车站的票,所以我们就坐了烂车。”

妻子没好气的样子横我一眼,她也不愿意这样。“就是你爸爸,”她说,“买一辆烂汽车的票给我们坐,他还怪我,神经病!”

这时那个在车上老是打量我们的男人也下了车,他一下车目光就落在我们身上,但只是停留了片刻,见我望着他,忙把视线移到了惨淡的天上。天空仍是那种阴沉沉地要下雪的样子,但雪没下下来。妻子说:“昨天听天气预报,今天会下雪,但是现在还没下。”

“天气预报经常不准,”我说,“有时候报落雨,结果出了太阳。”

“但是这是要下雪的相。”

“雪没下下来,今天还不见得有雪下。”

“现在的冬天没有以前冷了,以前这个时候早就是大雪封路了。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经常是还没放寒假就下雪了,坐在教室里好冷好冷的,脚和手上总要生好多冻疮。”

“我以前每年冬天都要生冻疮,现在的细伢子都不生冻疮了,气温升高了,天气没那么冷了。这是现代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产生的温室效应。”

女儿要解手,但那个简陋的厕所前始终站着一些男女,他们在那儿排队等着进去解手。我牵着女儿向屋后面背风的地方走去,这儿有一条接纳屋檐水的阴沟,我让女儿蹲在阴沟

上撒了泡尿。我牵着女儿走过来时，瞧见那个在车上老打量我们的男人正同妻子攀谈。我身上的一切器官都很好，视觉、嗅觉、听觉、味觉都是可以打百分的。我还在离妻子和那个男人很远的地方就听见那男人问妻子说：“你是叫黄江丽吧？”

妻子瞥着他，“你是——”妻子疑惑地问他。

他马上接过妻子的话说——声音很响亮，甚至还带点激动：“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高中同学张卫国，你不记得了？”

“记得，你是张卫国，我记得。”妻子脸上露出了高兴。

“你没怎么变，我一看见你嘴唇上的这颗痣，我就认出了你。”张卫国说，白白净净的脸上笑容于是就很开，好像拥挤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片空地一样。

妻子脸上确实有一颗黑痣，长在她上嘴唇的左边，比一粒芝麻略大一点，在她这张白皙的瓜子脸上非常显形。妻子曾经想把她这颗痣“点”了，就是说让硫酸把这颗痣消灭，我没有同意。书上说女子无痣不娇么，干吗要把痣“点”了？我牵着女儿走上去，妻子对我介绍长着一张国字脸的张卫国说：“张卫国，我的高中同学。我丈夫罗定。”当存在我心里的疑团随着他俩的对话而冰释，我对张卫国采用那种友好的笑容一笑后，妻子偏过头去又问张卫国：“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白水县三中教书。”

“你教什么？”

张卫国不好意思地一笑：“主要是搞行政工作，但教几节音乐课，因为我们学校没有音乐教师，所以我就上几节音乐课。”他说，“我几年前在县教委开会时，碰见过你妈妈，你妈妈说你在长沙市A中学教书，教音乐课是吗？”

“是的，”妻子望我一眼，“我教没点意思的音乐课。”

“教音乐蛮好的，”张卫国笑笑，声音和他的心情同时都

显得非常开朗，“其实我非常喜欢音乐，我还是我们学校教职工乐队的指挥，只是在你面前我就变得班门弄斧了。”

“我是对音乐没点热情了，”妻子摆出一副淡漠的形容说，“音乐一点也不被重视，学校里的一切都是围绕高考转，音乐课没什么意思。”

第二章

妻子和张卫国说话时，我牵着女儿上车去看了下，我看我的行李包被人翻动没有，行李包里放着一台 DF300 的照相机，一千多元——这是我省吃俭用的钱买的——我喜欢摄影，还经常在报纸或刊物上发表摄影作品，我是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我的那只棕色的人造革皮袋安然无恙地搁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看上去没人翻动过，车上仍坐着一些乘客，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瞪着那个中年司机修车，司机正揭开车头的盖子，在那里努力解决故障，两只手已被机器上的油弄得乌黑的了。我对自己的行李包放心后，在车上呆了几分钟，又被机油、汽油和其它物品组合成的气味赶下了车，我的鼻子不能容许这些气味大规模地侵入我的肺叶。我的呼吸道很脆弱，总是被这些气味弄得痒痒的难受，仿佛胸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炸裂一样。我牵着女儿跳下车时，妻子还和张卫国站在树旁说话。在学校里，妻子是个缺言少语的女人，脸上很少有什么笑容。她不怎么跟人交往，她除了睡觉，吃饭，教书，还是睡觉。她的音乐课一般总是在上午的三四节，她不

到九点半钟是不会起床的，即使星期一早上升国旗，她得在七点二十分起床，可是升完国旗，回来吃了早饭就又爬到床上睡觉，尽管有时候她并没睡着。她的心里已经不再有什么追求。她的习惯我早已熟悉，我曾经责备过她，责备她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没有用，她继续我行我素。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能力改变她，我在她眼里只是个没用的丈夫。她的两个姐夫都比我强大，她的大姐夫四十几岁就官至副厅级，还是手上握着一支“签单”笔的官商，领导着一个副厅级的大公司；二姐夫生意做得极红火，从前做钢材水泥生意，现在又在珠海做房地产生意，早已成了千万富翁。两个姐姐都是一身绫罗绸缎，穿着睡觉的衣服也比我和妻子穿着出客的衣服贵，这就是摆在我们和她的两个姐姐之间的区别。我家里那台黑亮亮的珠江牌钢琴（她的命和她的骄傲）便是她二姐姐以我女儿三岁的生日为借口送的，现在这台钢琴便是她们母女俩共同拥有的娱乐。每天下午至傍晚，女儿从学校幼儿园归来，我下厨做饭的时候，她便教女儿弹拜厄钢琴练习曲或中央音乐学院编的儿童钢琴歌曲教材。女儿非常乐意坐在琴凳上弹钢琴，并喜欢听那种清脆脆的琴声；妻子也很高兴守在女儿身旁指教女儿弹钢琴练习曲，这是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唯一的娱乐，除此之外，我再也感觉不出常常贪睡的妻子对生活还有什么热情和欢乐。

“黄江丽以前是白水县著名的美人呢，”张卫国笑着对我说，“那时候黄江丽站在县百货商店里，好多人都没事就到县百货商店里欣赏她哩。”

“是吗，”我说，“我从没感觉过她像你说的那么漂亮。”

“黄江丽读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县一中的校花，还是校文艺宣传队的活跃分子，一到元旦或国庆节，老师就要她上台

表演节目。我记得黄江丽抱着琵琶在台上独奏《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情景……

“我现在还记得你弹的这支曲子，你看我印象深不深？”

他居然哼了几句曲子，“她好久没弹过琵琶了。”我对这个男人记忆感到吃惊。

家里，板栗色的大柜顶上，搁着一只黑黑的人造革皮袋，内里装着只琵琶。黑黑的皮袋上盖满了一层灰，妻子甚至都懒得踩在椅子上去抹袋子上的灰尘。这是一只上海民族乐器厂生产的琵琶，我和妻子恋爱时，这只琵琶经常抱在妻子的怀里，《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十面埋伏》等一些琵琶独奏曲时常在我耳旁徘徊不散，让我不得不洗耳恭听。但琵琶太专业了，在她教中学音乐课的生活里实在没有用处，没有人需要琵琶，老师不需要，学生也不需要，甚至整个社会也不需要琵琶这玩艺了。舞厅或夜总会里需要的是轻音乐，是电子琴、电吉它、萨克斯管、小号、圆号什么的，剧团里也不需要，现代人对民族乐器不发生兴趣了，妻子所知道的是剧团里那些弹琵琶和敲扬琴的艺术家都是坐冷板凳的“队员”，于是觉得自己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毫无意义，还有一种自己被愚弄了的感觉。自从两年前，家里买了台钢琴起，妻子就把琵琶搁到了大柜上，再没理睬这只琵琶了。早几年的教师节上，妻子倒是在A中学的舞台上弹过《十面埋伏》这支琵琶独奏曲，弹得酣畅淋漓，铿锵有声，在一些教师看来非常不错，还对我称赞黄江丽说：“黄江丽的琵琶真是弹得好，可惜了。”那意思是黄江丽的这门特长“窝”在A中学这样的地方，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可惜了。张卫国又说：

“以前我们好崇拜黄江丽的，读高中时，黄江丽是县一中里最漂亮的女孩，又会弹琵琶。那时候我们都愿意为她出力。